

## 往事回忆

○冯锺豫（1939土木）

冯锺豫，191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其父为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先生。1935年入清华大学，1939年从西南联大土木系毕业。1949年赴台，长期从事水利工程设计和教育，贡献卓著。晚年致力于海峡两岸的水利科技交流，并数次返校参加校庆活动。本文节选自其90岁时撰写的自传《往事回忆》，时间跨度是从其1935年考入清华至1949年被派遣赴台工作。



冯  
锺  
豫  
学  
长

1933年暑假后时局安定些，我家回到天津。我在天津中学高中一年级，住校。次年春，我父亲冯景兰转到清华大学任教，我家搬到清华大学南院（现名照澜院）18号，在二校外左侧高地上；右邻是总务长沈履家，左邻是体育大师马约翰家。我伯父冯友兰住在清华园内乙所，与梅贻琦校长及陈岱孙院长为邻。

暑假后我转学到北京。那时中学很少招收高三转学生。我进了私立弘达中学。

次年7月起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仍住在学校宿舍。还记得7月1日清华大学招生考试逢到大雨，阜成门洞里水深尺余，须脱了鞋袜，涉水进城赶赴试场。那年我运气不错，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系、北洋大学矿冶系和交通大学土木系，我进了清华大学。

我从小身体不健壮；性格也多缺点，例如不顾细节，不听劝告；又每为人着想，而不顾自己。在弘达中学那一年，这些都有一些改进；生活规律，按时运动、读书；受良师指导，主办校刊，增加了自信。但常过份坚持原则、是非，而被人视为“迂”。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一方面尚获主管及同侪的信任支持；但一方面也因不圆活而吃了许多苦头。

1935—1937两年在清华大学作学生，接触了新环境，见到著名的学者，逐渐体认学问之浩瀚，懂得一些谦虚。此外更感到华北局势动荡，心情压抑、不安。那时社会反日情绪强烈普遍，清华大学学生的动态尤其受社会注意。但我忽然变得非常消极，课余时间都花在书上。偶而回家住一两天，解除些紧张。但我参加了课外加强军事训练队，是三位黄埔军校出身的教官，在军训课程之外，自动的指导一群自发的同学，作一些现代战争的研究，也有实弹射击训练，我非常认真。1936年春校庆，检阅时，我被派任掌大旗，很令我和

同学意外，现在回想仍感到荣耀。

1937年暑假，土木工程学系的二、三年级学生，还有几位地学系的同学应有暑期测量实习。那时山东省济宁县为一选定的农村发展实验县，需要一份大比例尺的地图，土木系主任施嘉炆教授与县方商妥，由我们这两班同学前往测绘。两班同学提早学期考试，特免参加那年大学生集中军训，于5月中旬出发前赴山东。两班同学共约45人，每人带了自己的脚踏车，并负责保管运搬一件系里的测量仪器，乘火车经天津、兖州到了济宁县。分成三角网、导线、水平、地形测量等小队，分驻县城和大乡镇。我与三年级的吕祯祥同学作天文观测，测定三角网点的经纬度。三角网点搭了高架，我们于夜晚带了测工从事观测。每队由一位教授或助教领队。当时颇受县民注意称赞，但工作开始后遇到了困难：第一是同学们缺少实务经验，书本上的知识，每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



冯钟豫学长结婚照

尚须研究思考；其次，夏初正值农作物盛长，阻碍观测，工作很吃力而进度缓慢。这些未经严格训练的学生，承担了过重的工作负担，业绩远不如预期。

1937年春，华北情势不安，我祖母自北京回到唐河故乡。到了初夏，平津也感到日军的压力，另一方面全国抗日情绪高涨。7月7日在北京城南的芦沟桥爆发了中日军队冲突，政府宣布全面抗战，我们自济宁县府得到消息，那些在北京西山参加集中军训的同学，结束了训练各返家乡。清华大学决定：抗日战争非短期可以结束，我两班学生愿自返中南部家乡者，可自行返家，其愿继续留队测量者，缩小工作区域，集中为两队。我留在刘庄那一队，继续工作。

7月下旬暴雨洪水淹没了济宁县境内大片较低地区，测量工作已无法进行。学校令我们终止测量，前赴长沙。同学们卖了带来的脚踏车，仍保运一件仪器，乘火车自济宁经兖州、徐州、郑州、汉口至长沙。我们暂住入清华大学在岳麓山下兴建的农业研究所——一座位于湘江西岸左家塋而尚未完工的大楼内。学校雇用了厨师，照顾十多位同学伙食。

在南行途中，平汉铁路上许昌及驻马店两车站距我老家最近。我小时依祖母，长大了时常想念她老人家，这次别来半年多，很想回家乡看望。在火车经过许昌站时，曾想下车回老家。我将保管的T2经纬仪托给同学，又去找领队的覃修典教授报告，但未能找到。在这情形下，应不应该离队呢？车停驻马店站时约在夜半，下着小雨，我下了火车，在站台上站了一阵，想到祖母常说的责任为重，

## □ 回忆录

就又上了车。

在左家垆住到10月，每日闲着。有时观看工人架设模板，拌浇混凝土。偶而走半小时到湖南大学，或在大学附近坐渡船到湘江东岸长沙市区观光，吃了山上橘园不少橘子。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课，土木系借用湘雅医学院上课，文学院在衡阳复课，其他学系在长沙圣经书院。我们自左家垆迁往市内军营。开学后，留在北方的同学陆续来到长沙，这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清华大学联合的学校，一千余学生“弦诵不辍”。学校供应膳食，供给一件棉大衣，这大衣我一直用到1945年赴美之时。

上海、南京战事转进，中央政府于11月24日自南京迁往重庆，长沙时有空袭警报。政府全力维持高等教育，学校艰苦支撑着。有些军事学校来到临时大学争取志愿从军青年，常听说某某到工兵学校去了，或是某某到陕北去了。

1938年2月放寒假。学校宣布，政府在昆明设立西南联合大学，希望同学们到大后方安心求学。愿意从陆上步行前往的人，可参加学校组成的团体，步行经贵州到云南。愿意乘车船经广州、海防（法属越南）经滇越铁路到昆明，或是乘车经广西南宁、海防前往的，由学校登记组成小团体。大家忧心前途，在校内纷纷讨论，时常有重要人士来校演讲，有人说国家面临大难，青年此时不从军报国更待何时，就有些人从军去了。一次决定性演讲是蒋梦麟校长请了陈诚先生（那时任军政部长）于一天晚间到校演讲，陈先生说：国家局势今日确实十分危急，但政府相信我

国能很艰苦地度过这次战争；战后一切建设须从彻底破坏后恢复重建，如果受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那时都没有了，将何以重建中华？他劝同学们现在到后方读书，将来响应政府召集，为国尽力。陈先生态度沉着，语气坚定诚恳，指示了远景，增加同学们信心。许多同学决定前往昆明。

1938年2月起，一部分同学开始动身经海防赴昆明。约三百位选择经湘黔滇陆路步行前往，政府派了陆军中将黄师岳带队，学校派了黄子坚教授（南开训导长）、闻一多教授（清华）、李继侗教授（清华）同行，于2月20日出发。我们每人一个小行李于早晨交学校卡车，随同厨师先赴下一宿地，并在中途预备中午打尖膳食。大队于八时启行；一日行程30至50公里（最多曾至85公里），大致与一般“起早”行程相同。宿地多系借住学校教室，地上铺了稻草可睡。2月20日晚上在长沙码头乘船夜行下湘江，第二日晨在洞庭湖西岸益阳县清水塘上岸，开始步行。湘西辰溪、芷江一带不甚平静，曾乘汽车至晃县。此后一路顺利，于4月28日到达昆明。

经其他路线同学，很多已先到达。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开学，文法学院暂设于蒙自县，工学院借用昆明拓东路迤西会馆，其他院借用昆明西城外之昆华师范及昆华农校校园。我住在迤西会馆一年多。北大、南开、清华的教师们与同学们先后来到昆明。昆明气候良好，民众纯朴忠厚，生活安定，学生也安心读书，教师们多为当时之权威学者，在对日抗战中，形成了战时中国文化中心。

黄师岳中将，当时约四十余岁，身材

魁武，诚恳和悦对人，与同学一齐走路食宿。谈话不多，从未见到他疾言厉色，两个月间，很受同学尊敬。湘黔滇一路顺利，由于沿途省、县、乡、镇之协助，亦由于黄中将领领导。湘西一带有地方武力盘据，闻黄将军曾说服了些地方首领放弃盘据，也有带众参加抗日战争的。在我团经过贵州西部之前，一批滇军经过，前赴华北战场。我们在路上见到落单的兵士，他们因病不能随军前行，行乞走向故乡，那情景令人感慨。途中听到了滇军在鲁西大捷的消息，体认抵抗外侮的代价。湘黔滇团行来数十天，同学各有心得与感受。我认为这是切实走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见到崇山峻岭、深谷急湍、平原坝子、忠厚而劳苦的民众，这些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很影响以后我对国家的心情。

伯父与父亲已先到昆明，并曾和先到昆明的同学、师长们在拓东路上欢迎湘黔滇团到达。伯父与父亲在昆明东城根租了房屋，不久伯母和母亲及弟妹们经天津、香港、海防来到。1941年疏散下乡，伯父住黑龙潭村，父亲住南菁中学后庙宇内，母亲在那校教课。锤芸妹与锤潜妹住联大宿舍，锤广、锤燕上小学，我在拓东路迤西会馆。

1939年7月，我们这些西南联合大学第二班毕业生学业结束，共有91位毕业（其后各年均有人陆续返校，陆续有人毕业）。十多位同班同学在几天内离开了学校，奔赴前程。我因留在校内，担任联络，几个月后知道了每个人到了哪里。我参加土木系与资源委员会电业处的合作计划：云南省水力发电蕴蓄电力之勘测；队上已有五、六、七、八、九级校友各一

位，在联大工学院内工作。半年后此队转归属昆湖发电厂。一年间，我参加过长江支流螳螂川和南盘江上游的勘查，大部分时间从事水文数据的整理。曾在滇池大观楼旁设立一处水位尺和一台自记水位计，在滇池水位记录中发现了很奇怪的潮汐式升降。

1940年夏，云南省建设厅计划在邻缅甸边境的腾冲县利用一瀑布发电，请施嘉炆先生主持，我被任参加筹备工作。领队是清华五级学长伍正诚先生（留德归国），另有二位同济大学毕业生（骆颖叔、王叔琦）。我们在瀑布旁庙内工作，作了些简单设计。后来我与伍先生意见不合，1941年4月我辞职返昆明。那时滇缅公路通车，是外国物资进口及国内商品输出的唯一陆上通路。1940年由昆明到腾冲时，先乘汽车经楚雄、下关、永平到保山，通常四天；再乘“滑竿”（二人抬的担架）步行四天过怒江、越高黎贡山到腾冲。辞职后须自负路费，我雇了挑夫担着行李，自己步行，越过高黎贡山，到保山洽妥了一辆货运卡车，搭“黄鱼”，赶路到下关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赶路到昆明，回到家里。次日上午到工学院见施先生，他惊奇我回来如此快速。他原谅我未经同意离开工作，并留我在新成立的水工试验室，帮助研究腾冲水力发电厂的闸门水力特性。后来覃修典先生接替了伍正诚先生，但不久日军自缅甸攻到腾冲，覃先生北走丽江，再南行到大理，返回昆明。同行的有十二级同学李鸷鼎及李连城二位及清华大学实习工厂领班木工洪先生及铁工张先生，他们随我们到济宁，到了长沙、昆明，又同到腾冲。

## □ 回忆录

1941年冬，我转到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建设厅和中国农民银行合办）。总工程师是朱光彩先生，当时有四处灌溉计划在进行：宜良县文公渠与龙公渠，开远县的竹园坝及沾益县的一处（尚未定名）。1944年初，委员会改组，朱光彩先生去了重庆，我也离开了，到同学宋金声先生的建设公司作了几个月的监工。暑假后我到联大任教员，也协助建设厅设计在盘龙江（昆明近郊）上一处蓄水坝。

1943年秋天，我曾为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一处可能开发的计划，前往安宁县和测量队研究。我到安宁的前一天，测量队一测工闹事，被乡长关了起来。我到县府时，县长派人接我到会客室，谈话很不客气。后来发现我并非为那测工事件而来，改变态度，饭后并请我上“烟榻”（鸦片烟也，我当然不会），当晚睡在县府内。第二天测量队的纠纷解决了，我才到测量队部。队长和我决定先回昆明报告，但这个灌溉计划就此停了下来。我领略了县长和乡长的权威，想推动一项建设，如果得不到县、乡长的合作，几乎是办不到的。我决心回校读书。

1942年，抗日战争已进行五年，日军优势已大不如前，而我国实力亦大减弱，所需重金属难自国外输入，要输出的钨矿（江西）、锡矿（滇南）运输也极为困难。政府为增加铜的生产，要我父亲到西康省荣经县（现属四川省）整理资源委员会的

一处金铜矿，去了两年，第二年母亲和锺潮妹也去了西康。那时锺芸妹任联大助教，锺广、锺燕和锺潜都由他带领。等父亲自荣经返来后，为云南大学借聘主管工学院，我家也搬到云南大学宿舍。

美国于1941年参战，至1943年冬，在欧洲战场上盟军已占优势，太平洋上美军越岛进攻顺利。战事结束虽尚远，但胜利已在望。国民政府考虑战后重建所需技术人力，与美国协议，在“租借法案Lend and Lease Act”下，派人员赴美，参与实务工作学习，我参加考选被录取。

1945年春，我在昆明等候赴美通知，祖母在唐河故乡病故。我伯父与我父亲赶回唐河治丧，他们没让我随行。祖母安葬后日军进攻南阳，唐河沦陷。他们得到政府资助取道西安、重庆、返回昆明。

1945年5月，我国远征军自印度攻入缅北，收复腾冲、龙陵，还师昆明。这对国内是很大的鼓舞。7月上旬，租借法案下赴美实习的第二批学员动身前往印度加



冯锺豫学长（左3）视察台湾翡翠水库工地

尔各答市，候船赴美，我由昆明乘坐美军运输机经缅甸到加尔各答Calcutta，飞越滇西横断山脉。到后住入近郊军营。经过一个月军营生活，于8月10日登上运兵船莱利将军号。同船约三千五百人，约一千人是欧洲战场上轮休的美国士兵，约一千人是我派赴美国受训的空军人员，约一千人是租借法案下我国交通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等选派赴美的学员，其中水利委员会12人。

登船时，大家穿着单衣军服，只准带一个小手提袋，卧舱在甲板下一层，是通舱；四层用帆布作成的吊床，床间空隙很小。浴厕公用，使用海水；船上有制造淡水的设备，淡水只供饮食。餐厅内有许多排长桌，放置食盘，人站在桌前吃，一桌可供10人用，吃完将盘子、刀、叉送到水槽洗净。这是专为运兵之军舰，约3000吨排水量。船上生活和在加尔各答军营差不多，大家已习惯了。

登船后经过两天夜航，驶出恒河河口，进入印度洋。那时欧洲战事已结束而日本尚未投降，航行中依战时运作：夜间熄灭灯火，晨8时作实弹射击演习20分钟，用船尾约5吋炮和甲板上多座机关炮。

两天后航程遇上飓风（台风），船在大浪中摇摆，很多人晕船，用餐的人少了。晚餐将毕时，听到广播新闻：“美国空军成功的将原子弹投放广岛。”我对原子弹尚无所闻，也不知道广岛在日本何处，有何重要性，但旁边用餐的一位美军官，却突然间面色凝重地收起餐盘走出餐厅。次日风浪仍大，战斗演练依旧，吃晚饭的人更少了，又听到广播新闻：“美国

第二枚原子弹攻击了长崎，日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餐厅内一阵欢声，长桌前相邻的人们互相握手，大家涌上了甲板。我国外交部保君健公使也乘坐此船赴巴拿马履新，广播召集船上中国人于8时在甲板上集合庆祝。到时甲板上挤满了中国青年，唱国歌，为战争中捐躯的同胞静默悼念，保公使简单的分析战争情势，他勉励同胞们努力建国。我和身旁的一位空军交换了以下谈话。他说：抗战结束，他习空战不复有用了，他祝我返国后建设成功。我说：战事结束得突然，国家元气大伤，复员必多困难，国家的地位靠军力，希望他受训有成，也希望国内不要内乱打仗。

次晨，船航离了台风圈，甲板开放，我上去看8时开始的作战练习，经过一小时，大概藉此庆祝战事胜利，也把那不再珍视的炮弹消化掉。海上平静，风清日和，船在碧海中前进，晚上也不再熄灯了。又过数日，船经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到直布罗陀港补给，然后横渡大西洋，9月3日下午进纽约港。在船上望见那自由女神像时，说不出的欢欣，感觉前途无限。

在美国学习、考察一年多，收获不小。但时时为国内情势忧心不安，还感觉到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人地位日降。三峡规划进行将近一年时，政府决定暂停，参加工作的人员，分批返国。我是第二批，于8月初动身，再度来到旧金山港，同行的10位，有王忠汉、杨访渔先生等。船行一路顺利，途中停泊过檀香山及横滨港。泊横滨港时，我在船上看到码头上工人衣服脏破，争着抢接美国人从甲板上丢下去的香烟，心中悲哀，不知国

## □ 回忆录



冯锺豫学长（中）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与同学高士龙（左）、徐炳华（右）合影内情形如何。

船停上海黄浦江码头，水利委员会代表张连荣先生来接，交给我一件水利委员会的派令，和河南大学的聘书。我与王忠汉先生乘火车来到南京，暂住三元巷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宿舍。自1945年至此，两年留美实习生活结束了。第二天，我到中央路水电总处，见了覃修典先生，他那时任规划组长，我留在规划组工作。

我在水电总处工作顺利愉快。规划组长覃修典先生，副组长唐季友先生，组内约二十人，工作均很认真。我住总处大院内宿舍，参加总处膳团。1948年春，国内情势紧张，我们（我与王楫女士）决定早日成家。我们分别函禀父母同意，选定了5月8日在南京华侨之家饭店为我们举行婚礼，宴会亲友，并请当时财政部长俞鸿钧证婚，我父亲请覃修典先生代他主婚，请

刘仙洲教授作介绍人，他是我父亲与岳父在北大时的同学。

1947年冬，台湾电力公司为修复战时受损的水力发电厂，向水电总处借调人力协助。王忠汉先生于1948年春和戴之峻、潘朴生、严自强四位被派赴台。后王忠汉先生要求增派。我那时完成了永定河官厅水库计划增加发电功能的研究，考虑多目标水利经济分析，特别注意洪水与防洪问题，当时在国内搜集实际资料很困难，而官厅水库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徐世大先生领导研究，资料较多，故报告得以完成。后来我又从事浙江的新安江水文与发电计算。王忠汉先生的要求到了总处，张光斗先生（那时为总处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为美国人J.Cotton）提名了徐修惠、顾文书、李锡山和我4人。张光斗先生当时对我说，台湾的工程建设值得去看看，等国内局势安定后，总处会尽早调你返来，你不要加入台电公司，免得无法调回。谁知，这一去竟是整整40年！

### 上期更正

P51 左栏第10行，应为裴艳玲

P55左栏第8-9行，应为曾国潢之

孙

P64 左栏倒数第2行，应为浦安修

P143 作者谭钰贞，应为1950地学

P144 左栏倒数第4行，应为1949年元旦前夜

P146 左栏倒数第9行，应为曹添